

探索与实践

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人文经济学探索

黄瑾 林铨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由此提出了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新命题。

福州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派江吻海、三山鼎峙,泱泱闽水与榕荫满城的独特风韵,共同交织出文化闽都的绵长福韵。20世纪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系统谋划福州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亲自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简称“3820”战略工程)。199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第七次党代会上正式提出“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而努力奋斗”,这是比“3820”战略工程更为长远和更高层次的目标,为福州现代化发展确立了总纲领。在福州市确定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发展目标30周年的今天,回顾福州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观察到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经育文、以文兴城的人文经济和谐发展路径。

以人为本,筑牢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奉“资本增殖”为主旨,不仅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历史性与创造性。以资本为主导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使人沦为物的附属,割裂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强调要更加重视分配正义、伦理道德、观念习俗等经济发展的人文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因此,我们在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方面,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另一方面,人民是生活在一定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中的具体人,或者说,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特殊载体。“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人文经济学始终坚持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人民性是实现文化与经济交融发展的应有之义与最终指向。这一“以人为本”的理论范式,在福州的现代化探索中得到鲜明体现。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鲜明提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该包括城市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居住方式、环境、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曾经的福州被称为“纸褙城市”,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发展方针,大力推动“菜篮子工程”“广厦工程”“安居工程”“造福工程”等民生工程,推动高速公路、深水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如此,福州市深刻意识到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人而不是建筑物。30年来,福州每年都将近八成的财政支出用于人民,累计完成为民办实事项目1400多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1995年的

4896元、2303元提高到2024年的60758元、30659元。福州还构建起覆盖17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区)、261条传统老街巷、1200多处重点文物古建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与人民携手持续扩大闽都文化的影响力。正是福州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将城市建设最终落脚到人文关怀之上,才能在推进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创造了独特的城市文化。

以经育文,促进经济与文化繁荣共生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财富积累方式与资源配置问题,并强调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文化由于自身难以度量而被弃如敝履,最终导致文化与经济长期处于“各行其是”的割裂状态。尽管在20世纪以后,西方社会重新审视经济学中的伦理维度,尝试进行带有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分析,试图将“文化”作为新型要素纳入“投入—产出”模型,但在本质上仅是为了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刻总结了文化与经济的

发展的物质成果转化为市民能够真切感受到的文化福祉。

另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地域文化具有促进社会主体交往的功能,可以显著提升经济活动的组织效能,从而为经济发展营造和谐环境。福建独特的海洋文化与儒家伦理塑造了闽商“重乡情、讲诚信、守契约”的核心特质,闽商通过宗亲会、同乡会等组织使商业活动超越单纯利益交换,成为情感与价值认同的载体。这种文化“抱团”模式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高效和谐的动力。

此外,先进文化更是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他在福州工作期间倡导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四下基层”等优

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改革开放以来,福州以持续的经济增长有效赋能文化建设,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中壮大文化产业,交出了一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繁荣共生的“人文经济学答卷”。

有效市场的功能在于提高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效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在市场条件下,文化产品想要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就不能故作姿态,必须重视市场需求。在竞争、价格等机制的作用下,有效市场可以激发各类文化创作主体的创新活力,推出更多满足各种文化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而当先进文化产品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有效市场还能引导文化项目投资。如,福州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开发,在三坊七巷形成“非遗+”文旅业态,将三坊七巷发展成为福州传统文化展示交流中心与文创产业基地,2015年起,连续9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千万人次。但市场也有其局限性,容易出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文化产业资本无序发展等问题,这正是有为政府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福州积极创新城市文化发展理



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辩证关系,“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这清晰地表明,人文经济学强调经济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有机整体。福州的现代化探索也实践着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文化存续和繁荣发展的前提,直接决定了社会能否创造出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文化的创造与欣赏,本质上是满足生存需求之后更高层次的“奢侈品”。只有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剩余,社会才能解放从事文化创造的劳动力,同时也解放消费文化产品的广大民众。在福州三江口坐落着茉莉花造型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2018年开馆以来,举办了超过900场各类演出及活动,其中公益演出和艺术活动超过150场,惠及近10万名市民。落实文化惠民理念的背后,是福州市历时3年、斥资数十亿元的投入。可见,文化高地的建设离不开物质基础的支撑,只有持续的财政投入与公共服务供给,才能将经济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赋能福州经济现代化发展

在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人类生产力,创造了远超以往一切世代总和的物质财富,开启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从对“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却又陷入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普遍依赖和崇拜中。对于生产效率的畸形偏好,对于价值增殖的极度推崇,把人们牢牢钳制在消费主义大网中,消费主义因此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的则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荒芜、文化生活的贫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

学习

于安思危 于治忧乱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告诫全党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出自清代魏源《默觚·学篇七》:“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病,不知无病之福;故君子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意思是在安定的时候应思虑危难,在稳定的时候要担忧动乱。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蕴含着对安危、治乱、兴衰等辩证关系的深刻洞察。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的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认识到国内外环境发生新的重大变化,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把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作为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统筹发展和安全,把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掌握了对风险挑战的战略主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锻炼提高,在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增强忧患意识、保持赶考清醒,始终居安思危,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新论

知名医师在社交媒体分享日常工作,专科医生把工作花絮拍成微短剧,医护人员在网络上做医疗科普……这些信息契合百姓对健康知识的需求,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然而,一些缺乏医学背景的网络博主利用公众的健康焦虑,把医疗科普异化为营销带货的工具。过度商业化的倾向,不仅背离了医疗科普初衷,更有损公共健康事业的严肃性,其潜在危害不容忽视。医学知识体系复杂严谨,无论是中医、西医还是营养保健领域,都有一定专业门槛。科普内容必须建立在科学证据和临床实践基础之上,这就要求科普者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将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语言的能力。虽然医疗科普的目标受众广泛,但对某些群体来说,它不仅是信息,更是“刚需”。例如,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慢性病高发、渴望了解疾病预防、合理用药以及日常保健等知识,对医疗科普的需求尤为强烈。慢性病患者则需要长期管理疾病,渴望掌握治疗方案以及如何调整生活方式,以提升生活质量。然而,这些信息需求最迫切的群体,往往也是信息辨别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

面对精心包装的“科普”内容,他们难以区分其中的科学成分与商业意图,容易将博主推荐的产品视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这种误导不仅可能导致经济损失,更可能延误规范治疗,带来不可控的健康风险。因此,针对弱势群体健康科普,需要更加注重内容的准确性、易懂性和非商业性。商业化科普往往更擅长制造噱头、渲染情绪,内容更易吸引眼球、引发互动,而严谨、客观、有时略显枯燥的科学普及,在传播效果上可能不如前者。部分人可能更倾向于相信那些“贴心”的博主,认为其提供了“主流医学不愿告诉你”的解决方案。这种认知偏差一旦形成,不仅影响个体及时就医和遵医嘱治疗,长期来看,还会影响医患信任的基础,干扰正常医疗秩序。医疗科普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播知识,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身体,寻求合适的健康解决方案。科普不应成为商业利益的附属品,科学至上和公益优先才能让医疗科普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公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刘莉
(据10月28日《经济日报》)

体育迷对优秀运动员的情感,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这种情感超越简单的偶像崇拜,变成一种对奋斗者、对拼搏精神的追随与致敬,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倡导的。体育迷对运动员真正的支持,一定是用美好的方式伴随他们“飞”得更高更远。优秀运动员炽热的爱国情怀、奋斗不息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追求卓越的信念,激励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奋斗强国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在对个人学业事业的追求中不懈努力。优秀运动员引领着追随者们奋斗前行的方向,给他们力量、勇气和信心。运动员与体育迷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令人感动的。当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汗如雨时,他们加油助威;当运动员在赛场上为国而战时,他们欢呼呐喊;当运动员遇到低谷成绩不佳时,他们担心落泪。而当体育迷们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瓶颈和低谷时,优秀运动员也会带给他们力量。想起喜欢的运动员坚持到底、永不放弃,他

们也会重新产生信心。尤其是运动员在赛场上遭遇逆境甚至是绝境时,还能凭借强大的内心顽强拼搏,带给观众深深的感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让人们看到运动场上的强者是如何努力与坚定,也使人们在观赛中明白生活的道理:当身体达到极限,意志会带你冲出重围。在体育运动中,体育迷对优秀运动员的喜爱与追捧,最初往往与他们爱国、奋斗、拼搏的意志品质相关。许多优秀运动员本身也非常仰慕某些其他项目运动员的卓越品格,他们惺惺相惜、共同进步。这是体育迷们“迷”体育、“迷”优秀体育运动员的初心,体育迷们应保持文明、理性观赛,不要让对运动员的热爱与支持异化为对他们的困扰。让我们在尽情享受体育盛宴的同时,不干扰运动员赛场内外的正常工作生活,文明观赛,为他们加油鼓劲,做一名正能量的体育迷。

——俞华
(据10月28日《光明日报》)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探索类似“潮汐式”管理模式。比如,河北正定夜市所在区域,白天是规范经营的停车场,晚间则是治理有序的网红市集,很多外地游客慕名前往,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类似探索表明,“潮汐摊点”为打破城市治理僵局提供了一种参考范式。城管等部门通过疏导为流动摊贩找到合法、有序的经营空间,并完善治理规则,明确摊贩的责任和义务,可以有效保障经营秩序、交通秩序与城市环境。从目前的效果看,“潮汐摊点”摆在了城市秩序和民生便利的平衡点上,找准了城市市容面貌、秩序维护与民生需求的“公约数”。应该说,这是城市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体现。对摊贩而言,有了固定摊位,客源稳定了,收入也提高了。对市民而言,统一规划的摊位整洁有序,买东西更放心,且“潮汐摊点”的摆放时间契合市民上下班的高峰期,既能满足消费需求,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城市交通的长期影响。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摊贩集中规范管理,减轻了监管负担,提升了管理效率。这种共赢局面,正是现代城市治理应该追求的目标。城市治理不能陷入“严管”和“放任”两个极端。在复杂多元的现代城市中,治理需要更多的弹性和包容度。流动摊贩是城市烟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满足了市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也为城市增添了活力。“潮汐”管理模式或许是城市治理的优解之一。当然,各地在推行“潮汐摊点”时应因地制宜,不妨深入调研,了解市民和摊贩的真实需求,找到最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城市治理最终是为人民服务。有关部门顺应各方需求不断优化城市治理的定位,疏堵结合,探索城市治理的措施,才能让城市有秩序、有温度、有活力,才能守住城市的烟火气。

——李英锋
(据10月28日《工人日报》)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稿件可发送至电子邮箱fzrbllb@qq.com